



序

苑

集

终 复

红旗出版社

D 6.1
序 莞 集

熊 复

红 旗 出 版 社

序苑集

熊 复

*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99 千字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书号 17160·025 定价 0.90 元

编者的话

本书汇集了熊复同志从一九八二年五月至一九八六年四月为一些书籍写的序和跋。这十篇序跋不是应景之作，也不是一般的图书评介，而是分别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政治理论的阐发和探讨。例如，《世界政党辞典》序言，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政党问题的基本知识，从政党的起源，政党的性质、特点和它在历史上的作用，到中外近现代史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及革命导师的建党活动和建党学说，乃至政党和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都作了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对其中一些问题并进行了理论概括，实际上是一篇研究政党学的论文，不仅有知识性，还有它的学术价值。又例如，《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新华日报代论集序言，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周恩来同志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六年为《新华日报》撰写的十八篇“代论”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意义，并着重分析了《民族至上与国家至上》、《我要说的话》等八篇“代论”。由于作者当时在《新华日报》工作，对这些“代论”的写作背景、深刻思想和政治影响比较了解，深有体会，这些介绍和分析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学习周恩来同志为《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其他几篇序跋，所谈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能在政治思想和理论上给人以启发。为此，我们将这些序跋汇集出版，希望有益于读者。

编 者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时代的哲学思考	
——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跋	1
要重视调查研究	
——《经济调查》公开发行序言	13
做一个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战士	
——《攻关者的赞歌》序言	18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红旗〉优秀理论文章选》序言	27
《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	
——新华日报代论集序言	32
一所新型的“抗大”式的革命大学	
——《中原大学校史》序言	60
编辑工作是一门学问	
——《新闻通讯与报刊言论的写作》序言	68
世界政党问题简论	
——《世界政党辞典》序言	74
 附录：	
建立和开创我们自己的政党学	
——在世界政党问题研究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	126

谈谈领导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领导科学》序言 134

我们的真正优势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简论》序言 142

时代的哲学思考

——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跋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华岗（又名华西园）同志的一部题名《规律论》的哲学著作手稿。这是他的遗著之一，因为他早已在十年前，即一九七二年，在含冤十七年的情况下离开了我们。使我们感到无比欣慰的是，不只是他的沉冤已得到平反昭雪，而且他作为老一代革命活动家、教育家和党的理论工作者的标格和风度，通过他的一系列遗著而永留人间。

我认识华岗同志，是在一九三九年四月我进入《新华日报》做编辑工作之后。那时他是《新华日报》总编辑。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学问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而写作评论文章如社论，真是“下笔千言，立马可待”。他对待同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从没有见过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但他对待政治上的原则问题却十分认真，从不苟同，也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意见。这一切引起我对他的尊敬，把他当做自己的导师。现在，想起他充满艰苦战斗的一生，他对党的宣传事业、教育事业和理论事业成绩斐然的建树，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品质，使我更加怀念和敬重他。

我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读完他的这部哲学遗著的原稿。感慨自然很多。如果要集中成一句话来说明自己的印象，那就是：这部著作表现了很强的时代精神。华岗同志身处含冤莫伸的幽禁环境，但他的思想并没有离开我们党的事业，没有落后于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始终在为党取得的每一个成功而高兴，为党遭到的每一个挫折而忧心。他把这些思虑都结合在自己的哲学探索中了。本来，作为党的思想战士，紧扣着时代的步伐来著书立说，这是华岗同志一贯的优点。只要回想一下，大革命失败后仅只一年的时间他就写出《中国大革命史》，抗日战争第三年，正处于艰难的阶段，他编写的《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就已问世，他的著作的这一特色就很清楚了。但是这部《规律论》，除了继续这一优点之外，毕竟有它的新颖之处，这就是它选择了研究客观规律性问题这样一个具有新的时代意义的哲学主题。

我们知道，研究客观规律性问题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同志是这样解释实事求是这一科学概念的，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毛泽东同志最早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也是哲学著作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的榜样。这部著作系统地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

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并把这个研究提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阐明了研究客观规律性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而且突出地强调了研究各种规律的特点和发展。他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①。研究战争问题如此，研究其他任何问题也同样如此。从实际出发寻求指导行动的规律，特别着眼于规律的特点和发展，是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的精华和特色。几十年间，毛泽东同志正是沿着这条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它是富有独创性的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因为中国革命不能不走具有自己时代和民族特色的道路，而研究这一革命的指导规律也不能不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华岗同志的《规律论》在反映这种具有我们时代和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上，是作了他自己的努力的。作者不仅以规律问题为中心来展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丰富内容，而且列有专门章节论述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和作用，论述规律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动力学规律类型和统计学规律类型）的特点及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论述规律和条件的关系，规律的作用范围、性质和发展方向如何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在论述辩证法三个基本规律时，作者还对各个规律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6页。

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此外，还有专门章节分别论述思维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特征和运用，等等。这些论述都着眼于规律的特点和发展，这在一般哲学教科书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里应当指出，当华岗同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我国经过了“大跃进”挫折以后的一九五九年到六十年代初的整个困难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①同中国革命经过长期探索才掌握住引导自己走向胜利的规律一样，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重新开始一个探索规律的艰难历程，如何研究客观规律性又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那时华岗同志虽然早已与世隔绝，但他充分利用了当时还能提供的一点点阅读书报的自由来了解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敏锐地抓住了社会主义重大转折时期的这个主题，并且从哲学上加以系统的研究。恩格斯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②华岗同志就是这样，从我们党当时所经历的由于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而造成的痛苦经验中，进行他的哲学思考的。

比如作者针对那时在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关系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指出：规律和法律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东西。

① 《红旗》1978年第7期，第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8页。

人们可以根据统治阶级的意志制定这样那样的法律，并且可以运用掌握在手上的权力强制推行，但是绝对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废除规律；人们能够发现各种客观规律，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规律。他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正确解决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承认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决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有规律的活动是自发进行的。混淆客观性和自发性，在理解和运用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时就会招致错误。假如在承认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时，把这个发展看作自发过程，就会陷于同社会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自流主义；或者相反，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看作可以由领导者意志或其他意志随意支配的过程，而否认规律的客观性，那就要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去。他从哲学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以及有计划按比例等经济规律的特点，说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特殊之点并不在于它们不再是客观的了，而在于规律起作用的形式已经改变，它们不再是通过人们的盲目的自发活动而是通过自觉活动起作用了。他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所依据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结构发展的经验，那时他们没有必要专门分析客观过程和自发过程之间的区别问题，但是在社会主义时代，研究这个问题就成为必要的了，否则就不可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他要求深刻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我们没有正确处理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关系而造成重大损失的经验，他说：“人们

现实地感觉到社会主义各种发展规律的作用，不仅是在它根据这些规律的要求而行动的时候，而且在它由于犯了主观主义错误以致违背这种要求的时候。……在这里，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遵循客观规律的重要性”^①。不待说，作者关注的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总结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从总的精神来看，可以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发。今天，我们必须坚决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再也不能重复那种主观主义错误了；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绝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要从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的自觉过程转移到自发过程去。

华岗同志的哲学探索还深入到了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即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华岗同志着重对人们在矛盾规律问题上的认识提出一些质疑。在他看来，把差别看成即是矛盾的观点，是导致阶级矛盾扩大化的一个理论根源。他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作了详细的科学论证。他认为，差别是对共性或共相而言，任何事物或现象都有共性（共相）和差别（殊相），而矛盾则是表示统一体内两个侧面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排斥和互相斗争的关系。“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因为差别固然可能包含着矛盾或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导到矛盾亦即转化成为矛盾，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②他举例说，现在全球共有一百多个国家和上千种民族，在所有这些国家和民族之间都

① 《规律论》第46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规律论》第221—222页。

存在着差别，其中有许多还是本质差别，但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国家之间以及任何一个民族和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矛盾。这种差别不同于矛盾的客观事实，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可以举出很多。他介绍了列宁《哲学笔记》中的有关论述，指出：列宁不但强调从差别向矛盾的转化，而且指明了转化的条件，指明只有差别尖锐化，达到本质的差别，达到对立，才能转化为矛盾；至于那些没有尖锐化，即没有达到对立的差别，依然是非本质的差别，而不是矛盾。关于差别即是矛盾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的不良影响，华岗同志在这里只是婉转地提到，而不如他在另一部手稿《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中说得更加明白，我们不妨转引几段作为补充：“把差别和矛盾看作同义语，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异象或差异，就会造成错觉，使人们走上夸大矛盾和臆造矛盾的荒谬道路。”“如果客观事物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或只有差别而这个差别又并未发展成为矛盾，那就不应该无中生有地或捕风捉影地去臆造矛盾。”“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光荣任务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矛盾和解决矛盾，而不是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一切以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为业绩的思想和行为，都必然制造悲剧和阻碍历史的进步，所以和马克思主义没有相同之点，而且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

华岗同志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着重剖析了矛盾规律的多种表现形式和与之相应的多种解决矛盾的方式。他认为，矛盾的性质和类型多种多样，解决矛盾的方式和方法及其结果也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把它们局限在一个固定的框框里。矛盾着的对立面经过激烈和反复的斗争，促进了事物或

现象的相互转化，这只是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和结果。宇宙间有许多对立面的矛盾，并不是采取一方打倒另一方和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而是长期甚至永远处于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中，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自动调整，就是该事物或现象的生命之所在。显然，这样一些新见解或新的探讨，对于推动我们去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规律的特点和发展是会有帮助的。而这些见解的意义当然还不限于社会生活领域，也涉及到对于自然现象的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在人类生活中引起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于矛盾规律在新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和新形式是应当加以认真研究的。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华岗同志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尝试去做了。有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阶级斗争规律的作用范围问题，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不可能明确地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提出来。但是应该说，他对规律和条件的关系的分析已经提出了一个可供研究这个问题的一般线索。他指出：规律发生作用所要求的条件的总和，决定着规律的作用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某一规律的作用范围大小与规律发生作用所要求的条件的数量成反比。某一个规律在其发生作用时所要求的条件越多和越复杂，它的作用范围就越小。如果顺着这条线索去研究，那末我们对于今天的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会有新收获的。

华岗同志这部哲学遗著中的时代精神，还表现在他对现代自然科学成果的哲学探求上。每个时代的哲学的前进，总是同自然科学的进步分不开的。恩格斯说：“象唯心主义一

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①。利用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从哲学上加以歪曲，可以为一种唯心主义的时髦哲学服务，这在资产阶级学者中大有人在，这样做也是最省力气的事情。然而也有另一种态度去接近和了解自然科学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的分析来检验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这样做比唯心主义的歪曲要难得多，但这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需的。可是在我们这个科学落后的国家，即使是从哲学专业工作的，许多人对这种必要性是认识不足的。一般哲学著作不仅很少引用自然科学的材料，即使引用一些，也大多只是用来作为某个现成的哲学认识的实例和注解。而华岗同志正是在这方面作了很大的突破，他不仅旁征博引，大体上给人们勾划出一个哲学和各门自然科学的内在联系的全貌，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力图从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的新成果中找到启发，用来打开我们的哲学眼界，开辟新的研究课题。在这方面，华岗同志对于动力学规律和统计学规律两种类型的区别，尤其是对后一种规律性类型的哲学分析——尽管这种分析仍然有待探索——是颇有特色的。统计学规律之所以成为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是由于量子力学的科学发现引起的。作者指出，在量子力学中，个别电子的运动通常与在集合（例如一百万粒子组成的集合）的运动中发现的一般的统计学规律性发生极大的差异。但是这种差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绝不是象某些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科学家所解释的那样，是什么电子的“自由意志”，而只能说明这是客观规律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虽然每个个别的电子的运动要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但电子的整个总体每一次的运动总是严格按照统计学规律进行的。至于作为整体运动的因素的每个个别现象，它在自己的个体运动中还受到其他规律的作用，因此在总体上起支配作用的统计学规律并不能完全决定这个别现象的命运，排除那种离开总体发展的总方向的偶然趋向。作者充分地阐述了统计学规律的哲学意义，指出人们必须加强对偶然性问题的研究，加强对大量现象的总体研究，从大量的偶然现象中研究和发现支配总体的客观运动规律。他通过对统计学规律性的哲学分析，帮助人们从只就个别学科来了解这种规律性的局限中跳出来，认识到统计学规律既存在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领域，也存在于社会科学的领域。他说，统计学规律是平均数规律，它在一个特殊领域中发生作用，即在组成统计集团的大量现象的领域，在事物和现象的总体中发生作用，它也在社会集团生活中发生作用。比如，我们要确定社会某一个大集团的发展所特有的规律性和趋向，而不是每一个单个人的发展所特有的规律性和趋向，就有必要使用统计平均数的方法。作者通过这样的论述告诉我们，研究自然科学的规律性知识和方法论，加以总结和提高，从中找出那些带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来，这对于丰富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是很有意义的。这里的统计学方法如果运用到社会生活中来，那就是一种进行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方法。这种方法在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特别在我们能够利用电子

计算机等现代的先进工具的条件下，有着很大的发展前途。比如我们正在进行的人口普查，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调查工作。在今天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应该使这种方法在使用中加以完善和发展，这是自不待说的了。

华岗同志的这部著作中有创见的地方还有许多，这里不能一一列举了。总起来，只是想说明：第一，一部较有价值的哲学著作必须是有创见的。哲学本身的发展总是一种时代精神的反映，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不管采取较为隐蔽的方式还是公开的方式，都必须面对这个时代人们所普遍关心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哲学上加以概括和研究并做出自己的回答，这种敢于反映时代精神的回答就必然是有创见的。在这方面，华岗同志所取得的成绩是有启发意义的。第二，哲学的创见不仅要有丰富的知识，而且要有革命的胆识，哲学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结，从事哲学的研究和写作需要丰富的知识，这一点当然是肯定无疑的。但要看到，哲学并不是消极地跟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后面爬行。哲学不仅要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就，而且要从这两方面发现新问题，为科学的继续前进指示新的发展方向和研究线索。哲学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必须具备渊博的学识之外，还要加上高屋建瓴的胆识。在这方面，华岗同志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重视的。第三，写一部有创见的哲学著作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尤其是作者在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时候，长年累月地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从事这样艰辛的脑力劳动，没有极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和顽强奋斗意志是根本不可能的。华岗同志在这部“发愤之作”里，已经很好地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